

乡村振兴与“十五五”叠加期农村养老服务社会化现实困境及其纾解路径

——基于湖北省F村的案例考察

夏 涛

三峡大学法管与民族学院, 湖北 宜昌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1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23日

摘 要

当前我国农村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家庭养老功能持续弱化、普惠养老供给不足,农村养老服务社会化已从“可选”转向“必需”。本文以湖北省F村为案例,采用实地调研、深度访谈与案例分析方法,依托2026年3~5月为期3个月田野调查一手资料,累计完成村“两委”干部、养老机构运营负责人、护理员、村内老人、乡贤志愿者五类主体共12人次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整理访谈原始文字素材2.4万字,同步采集日间照料中心月度运营台账、服务登记记录表、老年人满意度问卷18份、年度收支明细等量化实证数据,系统考察其“政企协同+基层治理驱动”养老服务模式的运行实践,揭示当前农村养老服务社会化面临的专业人才供给不足、资金保障不可持续、服务标准体系缺失、智慧化水平偏低、多元协同机制不畅等突出困境,深刻剖析困境形成的深层原因。在此基础上,从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拓宽资金筹措渠道、健全服务标准规范、推进智慧养老赋能、完善协同治理机制五个维度,提出契合“十五五”时期发展要求的纾解路径,每条路径均锚定F村本土资源禀赋、针对调研发现的具体现实问题设计落地举措,并配套可行性论证,为中西部山区农村养老服务社会化提供经验借鉴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

乡村振兴, “十五五”, 农村养老服务社会化, 现实困境, 纾解路径

Real Dilemmas and Mitigation Paths for the Socialization of Rural Elderly Care Services during the Overlapping Perio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15th Five-Year Plan”

—A Case Study of Village F, Hubei Province

Tao Xia

School of Law,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Ethnology, China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Yichang Hubei

Received: July 2, 2026; accepted: October 14,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3, 2026

Abstract

China's rural society is witnessing continuous population aging, declining family elderly care capacity, and inadequate inclusive elderly care provision. Accordingly, the socialization of rural elderly care services has evolved from an optional practice into a fundamental necessity. Taking Village F in the mountainous area of Hubei Province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adopts fieldwork, in-depth interviews, and case analysis. Based on first-hand field data collected from March to May 2026 the research conducted 12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village cadres, institutional operators, caregivers, elderly residents, and township elites, sorted out 24,000 original interview texts, and collected quantitative data, including monthly operation ledgers, service registration forms, 18 elderly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s, and annu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details.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its elderly care model characterized by the "government-enterprise coordination and grassroots governance-driven" approach. This study identifies major practical dilemmas in the socialization of rural elderly care services, including shortages of professional caregivers, unsustainable financial support, the lack of unified service standards, insufficient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and ineffective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on,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root causes of these problems. From five perspectives—talent team cultivation, diversified fund raising, standardized service formulation, smart elderly care upgrading,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mprovement—this paper proposes targeted mitigation paths tailored to the development demands of "The 15th Five-Year Plan". Each countermeasure targets specific practical problems discovered in F Village's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demonstrates implementation feasibility combined with local resource endowments. The findings offer empirical insights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socialized elderly care services in rural mountainous areas of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15th Five-Year Plan", Socialization of Rural Elderly Care Services, Practical Dilemmas, Mitigation Path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问题的提出

我国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农村老龄化呈现“速度快、程度高、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特征，乡村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显著高于城镇，乡村60岁、65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分别为23.81%、17.72%，比城镇分别高出7.99、6.61个百分点¹，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流进一步削弱传统家庭养老能力，空巢、独居、失能老人养老难题日益突出。随着“十四五”规划收官、“十五五”规划谋篇开局，养老服务作为重大民生事项，其战略地位愈发凸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

¹<https://www.mca.gov.cn/n152/n166/c45021/content.html>

提出“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²；《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也明确提出“完善基础民生保障，健全养老服务网络，根据各地情况和农民实际需求，推进敬老院等设施建设，大力推进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提质增效，积极发展互助养老，坚决不搞‘一刀切’”³。双重战略叠加之下，农村养老服务社会化成为破解资源短缺、提升服务效能、满足多元需求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基层治理引领、政企合作、村社互助、社会参与等养老服务模式，涌现出一批可复制的基层经验。但从整体看，农村养老服务社会化仍处于起步阶段，普遍存在“建得起、养不起、服务弱、难持续”的问题，专业力量不足、资金渠道单一、服务不规范、数字化滞后等瓶颈制约明显。

围绕农村社会化养老，现有研究主要形成三大研究脉络：第一类聚焦供给体系建构，陈倩、吴玉韶(2024)从县域协同治理视角剖析城乡养老资源错配问题，提出多元主体联动框架，但研究偏向宏观政策推演，缺少山区村落微观实证支撑^[1]；第二类侧重互助养老运行机制，王辉(2023)^[2]、宋月萍等(2024)^[3]验证低龄老人互助养老的内生价值，但未结合政企合作模式分析正式、非正式养老力量的融合障碍；第三类侧重域外经验借鉴，朱文佩等(2022)^[4]、张强等(2014)^[5]分别引介日本医养结合、美国多中心治理模式，但缺少本土化落地适配性分析。

现有研究仍存在两处核心理论缺口：其一，多数研究将“政企合作养老”“村社互助养老”割裂讨论，缺乏对“政企协同 + 基层自治”复合型模式的完整逻辑拆解，未能厘清企业、村集体、乡贤、普通村民多元主体的互动因果链条；其二，已有实证多选取平原城郊村落，针对武陵山区集体经济薄弱、交通闭塞、老龄化重度村落的一手田野数据稀缺，难以回应中西部山区养老服务可持续运营的现实痛点。

本文以合作治理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为核心分析工具，将政府、养老企业、村“两委”、老年协会、乡贤志愿者、老年群体界定为多中心治理主体，以社会资本理论解释乡贤文化、邻里互助等非正式制度对养老服务供给的支撑与约束作用，弥补现有研究理论应用单薄、山区微观案例缺失的不足。

湖北省 F 村立足山区实际，以日间照料中心为载体，探索“政企协同 + 基层治理驱动”本土化路径，在盘活闲置资源、降低运营成本、提升服务可及性等方面取得实效，但也同样面临社会化发展中的共性难题。基于此，本文以 F 村为典型样本，依托 3 个月田野调研一手访谈、台账、问卷数据，聚焦农村养老服务社会化的现实困境与成因，提出针对性纾解策略，既丰富农村养老研究的案例成果，也为“十五五”时期农村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指引。

2. 农村养老服务社会化的实践基础与实践逻辑

2.1. 实践基础

F 村地处湖北省西南部武陵山区，地理位置偏远，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相对落后，于 2017 年 10 月整村脱贫出列，现有人口约 810 户 2795 人，其中 60 岁以上人口 825 人，占比达 29.52%，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 2025 年末，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数量达到 32,338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达 23%)⁴，农村老龄化问题突出。村内主导产业为烟叶、生猪养殖及马铃薯种植等传统产业，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养老服务设施供给存在明显短板，全镇仅 1 所公办幸福院，主要面向特困供养人员提供集中供养服务，难以满足村内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养老服务需求。

在国家乡村振兴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政策的引导下，F 村立足本地实际，依托村民闲置的三层自建

²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603/content_7062633.htm

³https://www.gov.cn/gongbao/2025/issue_11846/202502/content_7002798.html

⁴F 村户籍人口、老年人口数据来源于 2025 年 F 村村委会户籍分户年龄台账(田野调研内部存档资料)；全国老龄化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方发布《202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602/t20260228_1962662.html

房及室外场地，结合村委会办公功能需求进行统筹规划与适老化改造，建设农村日间照料中心。同时通过与专业养老机构建立结对帮扶机制、打造“基层治理 +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整合政府、专业养老机构、村委会、村民等多方资源，构建了“政企协同 + 基层治理驱动”的养老服务模式，形成以“六助”服务为核心的养老服务体系，成为中西部地区农村低成本推进养老服务社会化的典型实践。

田野访谈摘录(村主任, 访谈编号 C01): “我们村没钱单独新建养老院, 企业老板自行出资翻建房屋后, 我们补助部分资金简单装扶手、防滑地板就能用, 一分钱不浪费, 就是人手、长期维持的钱不好解决。”

2.2. 实践逻辑

农村养老服务社会化的核心实践逻辑是“基层组织引领为核心、政企协同为支撑、资源整合为基础、本土适配为关键”，各核心要素相互联动、层层递进，形成闭环式运行体系，推动养老服务社会化在农村基层落地见效(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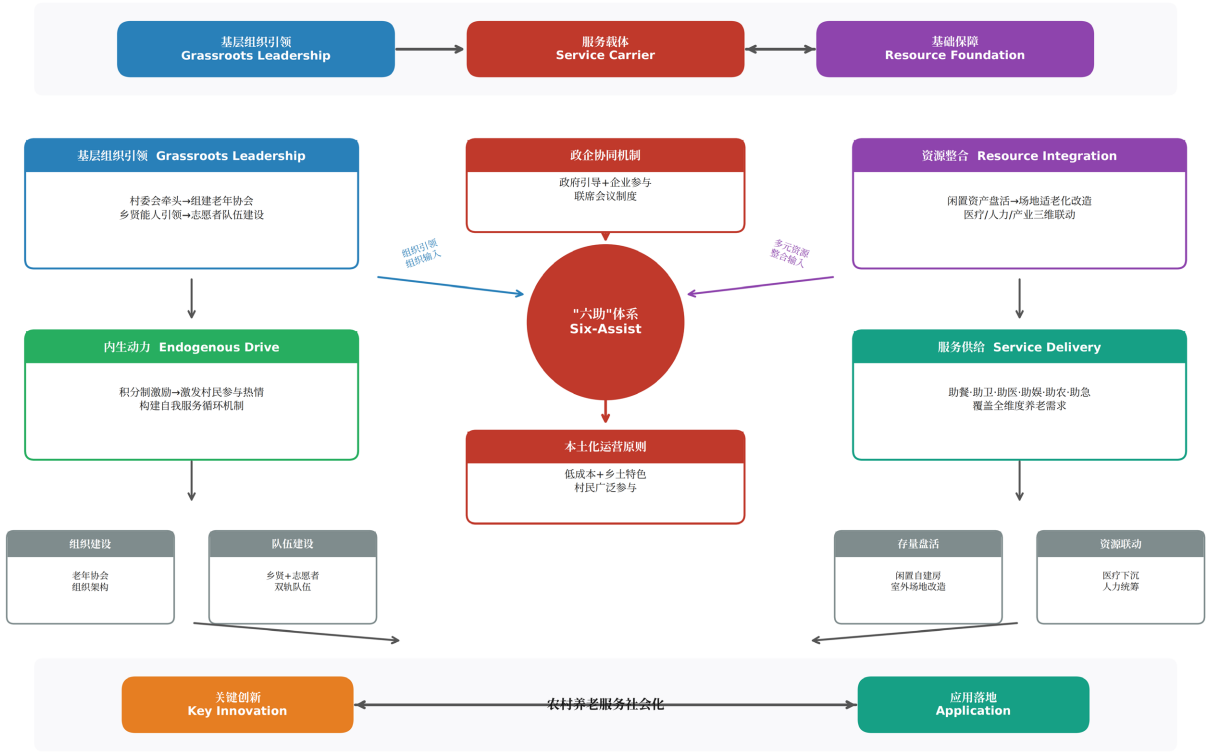


Figure 1. The practical logical framework of socialized rural elderly care services in Village F
图 1. F 村农村养老服务社会化实践逻辑框架图

基层组织引领为核心，激活养老服务内生动力，以村“两委”为核心组建老年协会，整合村内乡贤能人等力量，通过设立示范岗、志愿服务积分制度，激发村民参与养老服务的主动性。依托社会资本理论视角，村庄存续数十年的乡贤邻里文化构成非正式制度基础，村“两委”借助熟人社会网络降低养老服务动员成本；但访谈中多名乡贤(访谈编号 X03、X05)反馈，仅靠人情义务参与难以长期坚持，正式激励制度缺失制约内生动力延续。

政企协同为支撑，夯实养老服务供给能力，政府将中心建设纳入民生实事，落实资金补贴与监督管理；专业养老机构通过结对帮扶，输出管理制度、开展人才培养，实现政企优势互补。

资源整合为基础，降低养老服务运营成本，盘活村民闲置自建房资源，统筹村委会办公、养老服务

等功能,实现“一室多用”,整合医疗、劳动力等资源提升利用效率。从合作治理理论来看,政府掌握财政、政策资源,养老机构具备专业运营技术,二者本应形成互补均衡合作关系,但实地调研发现企业方权责、盈利空间未明确界定,形成合作失衡。

本土适配为关键,保障养老服务可持续发展,立足农村实际坚持低成本运营,推出助农等特色服务,招募本土村民组建服务队伍,让养老服务贴合农村生产生活需求。

3. 农村养老服务社会化的实施成效与现实困境

3.1. 实施成效

一是“六助”服务体系初步满足了老年人基本生活与医疗需求。日间照料中心围绕农村老年人日常生活的核心痛点,构建助餐、助卫、助医、助娱、助农、助急六大服务模块。其中,助餐服务每日为20余名老年人提供营养午餐,重点解决空巢、独居老人因行动不便或灶具简陋导致的“吃饭难”问题,保障其基本膳食营养;助医服务依托与村卫生室的联动机制,开展健康监测、代购药品、协助就诊等项目,为村内老年人逐人建立健康档案,实现基础健康信息的常态化记录与跟踪。本次回收18份老年人满意度问卷,对助餐、助医两项基础服务满意度分别达88.8%、83.3%;全年助餐累计服务6120人次,上门助医、代购药品服务203次⁵。访谈独居老人(编号L07):“以前自己做饭懒得开火,一天只吃一顿,现在中午去食堂有热饭,头疼脑热有人帮忙拿药,方便太多。”尽管服务覆盖面仍有限,但相较此前村民自行解决就餐与就医问题,中心提供的集中化、常态化服务显著改善了参与老人的生活便利程度与健康获得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老年群体“没人管、没人帮”的现实困境。

二是农村闲置资源得到有效盘活,设施建设与运营成本明显降低。F村日间照料中心的建设并未另辟新址、新建场馆,而是依托村民闲置的三层自建房及室外场地进行改造利用,将原本空置或低效使用的存量资产转化为养老服务空间,避免了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在空间功能配置上,中心统筹村委会日常办公与养老服务双重需求,实现场地“一室多用”——白天开展老年活动与就餐服务,其余时段兼顾村务办公与会议功能,使同一物理空间在不同时段承载不同服务职能,有效压缩了场地租赁与维护的额外支出。这种“就地改造、功能叠加”的资源利用方式,契合山区农村集体经济薄弱、财政投入有限的实际约束,为同类地区低成本推进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操作路径。

三是基层组织凝聚力增强,乡风文明水平有所提升。“基层治理+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在实践中充分发挥了村“两委”的组织统筹功能。村“两委”以老年协会为抓手,将乡贤能人等嵌入养老服务的动员与执行环节,既拓展了基层组织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渠道,也使养老服务成为村级治理的日常工作内容之一,增强了基层组织在群众中的号召力与公信力。与此同时,中心鼓励低龄健康老人参与高龄失能老人的日常照料与陪伴服务,形成了“以老帮老、以近帮远”的互助氛围。这一做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专业护理力量的不足,也在村庄层面营造了孝老爱亲、互帮互助的乡风导向,使养老服务从单一的外部供给逐步向村民自发参与、邻里互助共担的方向延伸。

四是政企协同的农村养老模式在基层初步落地。F村的实践形成了“政策引导+专业支撑”的合作格局:政府端将中心建设纳入民生实事项目,提供启动资金与运营补贴,并承担日常监督职责;专业养老机构则通过结对帮扶,输出管理制度、服务流程与培训方案,弥补村级组织在专业化运营方面的能力短板。这一安排使政府资源与机构专长实现了初步互补,也为探索政府购买服务、企业结对帮扶等新路径积累了基层经验。企业负责人访谈摘录(编号Q01):“我们的护理服务没有稳定服务费,只能靠政府少量项目补助,想做康复治疗增值服务,但村里老人付费意愿低,盈利空间几乎没有,投入回报太少。”

⁵助餐人次、满意度问卷数据均来源田野调研收集。

尽管当前政企协作仍处于起步阶段，双方权责划分与常态化合作机制尚需进一步明晰，但 F 村的实践已为多元主体共建农村普惠养老服务体系提供了一个可供观察与讨论的基层样本。

3.2. 现实困境

专业人才短缺，服务能力难以适配专业化要求。护理人员以本地村民为主，现有固定护理员 2 名，1 人接受过 3 天短期养老护理培训，缺乏系统专业培训，难以提供高质量医养结合、康复护理等服务；培训频次低、时长有限，专业能力提升缓慢。村“两委”干部访谈(C03)提及，护理员工资和城市相比较低，无社保、绩效、晋升渠道，专业护工不愿下沉乡村；本土护理人员多兼顾自家农活，难以提供 24 小时应急照护。

资金来源单一，难以支撑可持续运营。运营高度依赖政府财政补贴，社会资本参与度低；村集体经济反哺能力有限，公益服务收费低，难以覆盖运营成本。

标准体系缺乏，协同机制不畅影响规范化发展。“六助”服务未建立统一质量标准与操作规范，服务质量参差不齐；政企权责划分不清，缺乏常态化监督评估机制。

技术应用不足，智慧养老水平难以匹配战略导向。信息化建设水平低，未配备一键呼叫、健康监测终端等设备；未建立数字化管理体系，服务仍以传统人工方式为主，精准度与效率较低。

4. 农村养老服务社会化困境的成因剖析

顶层设计与基层落地存在落差。普惠扩面政策到位，但针对山区农村的人才、资金、设施配套细则不足，基层执行缺乏稳定支撑。

人力资本投入长期不足。农村养老岗位薪酬低、吸引力弱、上升空间小，专业人才不愿下沉，本土队伍培训体系不健全。F 村 2 名护理员均无法享受公益性岗位补贴、工资低，县域人才政策未覆盖村级日间照料从业人员，岗位吸引力持续走低，形成“招不来、留不住、不会干”的人才闭环困境。县域养老服务体系构建中，专业照护人才培养、队伍稳定机制普遍缺失，城乡专业资源配置差异显著，进一步加剧农村养老服务人才短板[1]。

治理结构与数字化转型滞后。村“两委”人力有限，身兼乡村振兴、综治、民政等多项工作，无专职养老服务管理人员。政府、养老企业、村卫生室分属不同主管部门，跨部门信息壁垒严重。智慧养老设备采购、年度运维成本较高，单套健康监测设备采购成本超万元。F 村卫生室健康档案、照料中心服务记录、民政老人福利信息三套资料完全独立，无数据互通渠道，每次上门服务需重复核对老人基础信息，降低服务效率。县域层面养老信息碎片化、部门间信息孤岛问题突出，健康、福利、家庭资源整合不足，制约服务精细化与标准化推广[1]。

投入机制与公益属性不匹配。养老服务公益性强、市场化收益低，单纯依靠财政难以长期支撑，多元筹资机制尚未形成。村内老人多为低收入农户，每月可承受康养增值服务付费较低，市场化康复、旅居养老短期盈利能力弱，企业主动投资意愿极低；村集体经济烟叶、种植产业收益波动大，无法稳定提取养老专项资金。

标准化建设滞后于实践推进。基层重建设、轻规范，重运营、轻监管，服务标准、安全规范、评估体系建设滞后，尚未与国家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有效衔接[6]。多中心治理框架下，社区养老服务需明确服务流程、质量管理与监督评估规范，而农村地区普遍缺乏制度化、标准化支撑[5]。

5. 乡村振兴与“十五五”叠加期农村养老服务社会化纾解路径

5.1. 强化人才支撑体系，提升养老服务专业化水平

依托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政策，扩大“以工代训”规模，每月选派护理人员到专业机构系统学习；开

发养老服务公益性岗位，重点招聘村内留守妇女、退休乡村医生等具有一定基础的本土化人才，完善薪酬增长机制；建立荣誉激励体系，稳定并壮大专业服务队伍。村内现有 4 名退休村医、留守妇女具备基础照护能力。借鉴低龄老年人劳动参与的经验，吸纳低龄健康老人充实互助养老队伍[3]。积极老龄化背景下，低龄老人具备再就业与社会参与能力，可通过时间银行、志愿服务积分等机制，将低龄老人转化为稳定养老服务力量，缓解专业人员不足[7]。通过积分制和时间银行等制度化激励手段，构建“老人互助机制”，将低龄老人的互助意愿转化为可持续的互助行为，从而弥补专业照护力量的不足[2]。

5.2. 拓宽资金筹措渠道，增强养老服务运营可持续性

构建“政府补贴 + 社会资本 + 村集体经济 + 慈善捐赠”多元化筹资体系。落实政府购买养老服务政策，推动政府购买服务常态化，根据老年人服务需求与中心运营成本合理确定购买服务项目与金额。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中心运营，引入专业养老企业开展康复理疗、健康管理等市场化增值服务，在保障公益服务的前提下，通过市场化运营实现收益反哺，弥补运营资金缺口。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引导村集体经济收益按比例反哺养老；F 村地处北纬 30 度武陵山区，平均海拔 1000 米至 1200 米，气候适宜，自然资源优渥，正逐步探索乡村旅游和康养产业的发展路径，届时，可同步开发“旅居养老”模式，对村内闲置农房和土地进行改造，打造乡村田园旅居养老新空间[8]。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慈善捐赠平台，链接乡贤、企业等社会力量资源，设立养老服务专项基金，规范基金管理使用，为养老服务发展提供持续资金支持。

5.3. 健全协同治理机制，完善养老服务标准体系

明晰政府、企业、村社权责边界，建立定期联席会议制度；参照国家规范制定“六助”服务操作流程与质量标准；依据《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等国家标准，细化助餐、助卫、助医、助娱、助农、助急的操作流程、质量要求与安全规范，实现服务有标可依、有据可查[6]。建立服务对象满意度测评体系，将评估结果与政府补贴、机构帮扶成效挂钩，完善多中心治理下的监督评估机制。借鉴美国多中心治理经验，构建政府、专业机构、村社、村民多元主体协同机制，明确权责分工、合作流程与绩效评价，破解协同不畅、监管缺失问题[5]。

5.4. 深化基层组织统筹功能，推进养老服务智慧化升级

发挥村“两委”统筹协调作用，建立“医养联动”机制，打通村卫生室与日间照料中心老人健康档案数据互通渠道；推广标准化“时间银行”线上登记、志愿者积分数字化管理；向上级民政申请山区村级智慧养老专项补助资金，统一配备居家一键呼叫设备、便携式健康监测终端，搭建村级养老服务简易信息化管理系统，实现老年人服务需求与供给智能匹配，借鉴日本“医养结合”社区养老经验优化农村医养服务衔接[4]；推广“时间银行”与志愿者积分管理；争取政策资金支持，配备一键呼叫、健康监测等智慧设备，搭建养老服务信息化管理系统，实现需求与供给智能匹配。日本通过构建地域医疗服务体系与社区综合护理体系协同发展模式，成立专项基金保障医养融合落地，可为农村医养结合、服务可持续提供重要借鉴[4]。

5.5. 锚定国家战略要求，推动养老服务模式本土化升级

在保障基础公益“六助”免费服务前提下，推出低价位差异化康养收费服务套餐；系统总结 F 村盘活闲置农房、低成本改造、政企结对、低龄老人互助整套实操经验，形成标准化操作手册，向周边同类型山区村镇复制推广，形成县域联动发展格局。立足县域养老服务协同治理要求，推动本土化模式向周边村镇辐射，以点带面完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促进城乡养老服务均衡发展[1]。

6. 结论与展望

乡村振兴与“十五五”叠加期，推进农村养老服务社会化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工程。湖北省F村的实践表明，基层组织引领、政企协同、本土适配、普惠兜底是适合中西部农村的可行路径，但当前仍面临人才、资金、标准、智慧化、协同机制五大现实困境。破解这些难题，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与系统思维，以人才强能力、以资金保运行、以标准提质量、以智慧增效率、以协同聚合力，推动农村养老服务从“有”向“优”、从“覆盖”向“提质”转变。

展望“十五五”，随着政策支持加大、资源投入增加、治理能力提升，农村养老服务社会化将朝着专业化、普惠化、规范化、智慧化、一体化方向加快发展。各地应立足村情实际，因地制宜优化模式、完善机制、强化保障，让农村老年人享受到更便捷、更优质、更有尊严的养老服务，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筑牢民生根基。

参考文献

- [1] 陈倩, 吴玉韶. 县域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养老服务体系构建研究[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24(1): 56-64.
- [2] 王辉. 农村互助养老长效机制: 理论建构与实现路径[J]. 南京社会科学, 2023(2): 65-75.
- [3] 宋月萍, 张光赢, 彭可余. 中国低龄老年人劳动参与的现状、特征及趋势[J]. 人口研究, 2024, 48(2): 75-89.
- [4] 朱文佩, 林义. 日本“医养结合”社区养老模式构建及对我国的启示——基于制度分析视角[J]. 西南金融, 2022(1): 76-87.
- [5] 张强, 张伟琪. 多中心治理框架下的社区养老服务: 美国经验及启示[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4(4): 122-127.
- [6] 全国社会福利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GB/T 35796-2017 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S].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 2017.
- [7] 石丹浙, 赖德胜. 积极老龄化背景下低龄老年人再就业现实困境及其纾解路径[J]. 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46(6): 11-15+115+2.
- [8] 徐紫薇, 金晶华.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田园旅居养老的价值、困境与策略[J]. 乡村科技, 2026, 17(1): 23-27.